

敦煌文化與中外交流

絲路重鎮敦煌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敦煌的交通算不上發達，但這並非古代的狀況。

敦煌位於河西走廊的最西端，是一塊地處沙漠戈壁中的小綠洲。距今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有月氏、匈奴等遊牧民族在這裡活動。漢武帝時期，出於抗擊匈奴的需要，派遣張騫於公元前 138 年和公元前 119 年兩次出使西域，使中國與歐亞大陸之間的交通全線打通。

拿漢代的中西交通為例：由敦煌向東，穿越河西走廊可到達中原長安和洛陽；由敦煌向西南，出陽關南行，或由敦煌向西北，出玉門關北行，是絲綢之路新疆段的南北兩條經典線路，翻過帕米爾高原，經過中亞，向南可到南亞古印度，向西可到古代波斯，繼續西行可到地中海東岸，入地中海西行到古希臘羅馬，入地中海南行可到北非古埃及。到了隋代又增加了一條道路，即越過戈壁沙漠，沿天山北麓西行的草原絲綢之路，也可到地中海的東岸。因此，敦煌成為漢唐時期「絲綢之路」上總管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在 13 世紀古代海運暢通之前，陸上通道是中國與西方交通的主要通道，敦煌也就很長時間以來一直處於重要的戰略位置。

關於「敦煌」這個名稱含義的由來，目前人們的認識還不一致。漢文「敦煌」一詞最早出現在《史記·大宛列傳》所記載的張騫自西域歸來後給漢武帝的報告。東漢的應劭最早對這個名稱加以解釋，認為「敦，大也；煌，盛也」。但「敦煌」這個漢語名詞在敦煌設郡之前就已經出現，所以應劭等人的解釋難免是望文生義的附會之說。近年來學者多認為「敦煌」是建郡之前居住在當地的少數民族對於本地區的稱謂，但譯自何種語言在東漢時就已失考。

敦煌建郡之後，呈現出一片繁盛的景象。敦煌東部 61 公里處的懸泉置遺址便能說明這種在政治外交上，中原和西域使者往來不絕的情形。懸泉置是一個郵政所兼驛站、接待站。這裡出土的西漢昭帝(公元前 87—前 74 年)以後的簡牘表明，敦煌曾接待過來往於漢王朝和西域之間的大月氏、康居、大宛(今烏茲別克共和國境內)、龜茲、于闐、罽賓(今克什米爾)等 29 國使節。

敦煌關鍵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古代中西貿易的中轉站，西域胡商與中原漢商通行於「絲綢之路」上。比如，在莫高窟第 296 窟的壁畫中便描繪了中外商人。一些西域客商長期住在敦煌一帶。本世紀初，敦煌長城出土了一封公元 4 世紀的粟特文書信。它是在此經商的粟特商人寫給他在中亞撒馬爾罕(今烏茲別克斯坦)的

主人和親屬的，信上說：中國的洛陽被匈奴人燒了，我們現在在敦煌、酒泉、武威一帶經商。又如藏經洞出土的公元 8 世紀《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了敦煌以西「興胡泊」的地名，即胡商聚居之地。藏經洞的寺院帳目中登記了高檔織物、金銀器、寶石、香料、珍稀藥材等許多西方來的舶來品。這些西方物品都是西域胡商通過絲綢之路帶來的商品。另外，莫高窟北區石窟發現了當時流通的公元 5 世紀波斯銀幣。

南朝人劉劭在註解《後漢書》時，引用《耆舊志》形容敦煌：「華戎所交，一都會也。」由此也可見敦煌作為邊陲重鎮在商業交往和文化交融上的盛景。

營建莫高窟

來到敦煌的除使節和商人外，還有東來傳教的西域僧侶和西行求法的中國僧侶。佛教傳入中國的路線有陸、海兩條，但早期應以陸路為主，這樣的路線也經由敦煌。在懸泉置曾出土了這樣一支漢簡，它的釋文是：「少酒薄樂，弟子譚堂再拜請。會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門西入。」它相當於一封邀請函，「弟子譚堂」邀請對方到「小浮屠里」這個地方來做客。值得注意的是「小浮屠里」這個地名。「浮屠」有佛、佛塔的含義，這說明可能早在東漢時期佛教就對敦煌地區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在莫高窟第 332 窟發現的唐代《李克讓修莫高窟佛龕碑》記述了莫高窟始建的緣由：「(前)秦建元二年(公元 366 年)，有沙門樂僔」，「嘗杖錫林野，行止此(鳴沙)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樂僔和尚被這種奇異的景色感動了，認為這裡是聖地，所以就在莫高窟「造窟一龕」。

從公元 366 年開始，開鑿石窟的工程一直持續了 1000 多年。明朝朱元璋開始修建嘉峪關，經過近 170 年的修築，直到公元 1539 年嘉峪關建成為一座完整的軍事防禦設施。此後，敦煌被關到了嘉峪關外，莫高窟洞窟的主人們和敦煌當地居民搬進了關內，莫高窟從此開始陷入沉寂和無人管理的狀態。1000 多年的修建造就了輝煌燦爛的敦煌石窟藝術。經過統計，莫高窟現存 735 個洞窟，4.5 萬平方米壁畫，2000 多身彩塑。它位於距離今天敦煌市東南 25 公里的鳴沙山東麓斷崖上，坐西朝東，南北長 1680 米，高 50 米。洞窟分布高低錯落、鱗次櫛比，上下最多有 5 層。

為什麼莫高窟有如此高的研究價值？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世界沒有一個地方，保存有 10 個世紀都不間斷的美術作品。上世紀 40 年代，張大千來到敦煌臨摹壁畫，1944 年在成都舉辦敦煌壁畫臨摹展的序言中，他寫道：「大千流連畫選，傾慕古人，自宋元以來真跡，其播於人間者，嘗窺見其什九矣。欲求所謂六朝隋唐之作，

世且笑為誕妄。獨石室畫壁，簡籍所不在，往哲所未聞，千堵丹青，遁光莫曜，靈蹤既闕，頹波愈騰，盛衰之理，吁乎極矣！」這就是說，世間流傳的畫作，宋元時代較多，張大千自認為基本都看遍了。隋唐以前的繪畫其他地方都找不到，張大千發現它唯獨保留在敦煌石窟中。外來的佛教藝術經由絲綢之路上的敦煌傳入中原，中原的畫風反過來又會影響敦煌。漢唐時代，長安那樣的地方是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也是佛教傳播的中心。可以想像，南北畫家雲集在那裡，在寺廟的牆壁上創作了高超的壁畫。可是經過朝代更迭與戰亂，以長安為代表的中原城市的寺廟被廢棄了，精美的壁畫也都不存世。如今要看反而就要到一個「荒涼」的地方，那就是敦煌。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莫高窟藏經洞中保存的一批珍貴文物。**藏經洞是莫高窟第 16 窟甬道北壁的一間密室**，當年王道士在清理積沙時無意中發現了它，裡面保存有公元 5 世紀至公元 11 世紀初的佛教經卷、社會文書、刺繡、絹畫、法器等文物 5 萬餘件。此後藏經洞經過外國探險家和盜寶者的劫掠，不少文物現在都藏於海外。這些文物被譽為是「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和「古代學術海洋」。這裡面約 90% 的文物都是佛教文獻。不少是藏外佚經(即《大藏經》中未收佛經)，不僅可補宋代以來各版大藏經的不足，還為佛教經典和佛教史的研究打開了新的門徑。敦煌佛經中還有不少被認為是中國人假託佛說而撰述的經典，即所謂「偽經」。這些疑偽經具有反映中國佛教思想的特點，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寶貴資料。敦煌文獻除漢文典籍外還有梵文、古藏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突厥文、希伯來文等非漢文典籍。除了佛教經卷外，敦煌文獻中還保存了我國的道教，外來的摩尼教、景教和祆教文獻。上述非漢文文獻和外來宗教文獻為我們研究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歷史證據。

1987 年，敦煌莫高窟申請世界文化遺產，遴選標準共有六條，只要符合其中一條，便可以批准入選世界文化遺產，而莫高窟符合全部六條標準。據了解，世界上符合全部六條標準的世界文化遺產只有兩處，一處是威尼斯，還有一處便是莫高窟。

中西文化交流成就敦煌文化

由於所處的特殊地理位置，敦煌成為接觸西方不同文明的前沿之地。但需要強調的是，從公元前 111 年設郡，到公元 366 年開鑿莫高窟，這 477 年的歲月，使漢文化在這裡深深紮根。佛教和佛教藝術是外來文化，它在漢文化的土壤里發芽開花。莫高窟對外來文化的接受是有選擇性的。在龜茲的克孜爾壁畫中，可以看到印度式「豐乳、細腰、大臀」、「遍體圓淨光」的裸體舞女和菩薩形象，但這樣的形象一來到敦煌便銷聲匿跡，代之以「非男非女」的菩薩、伎樂和飛天的形象。這不僅適應了儒家倫理道德和審美風尚，又沒有違背佛教「菩薩無性」的思想，

是外來佛教中國化的體現。

包括敦煌石窟在內的中國北方石窟群，大多受到南亞印度佛教藝術的影響。對莫高窟影響最大的外來文化是古印度的佛教藝術。印度原始佛教時期(公元前 5 世紀—前 3 世紀)沒有佛教藝術。孔雀王朝阿育王(公元前 273—前 232 年)時期，出現了最早的雕刻形式的佛教藝術，但這時沒有佛陀偶像。到印度貴霜王朝(公元 78—241 年)進入大乘佛教時期，出現雕刻的被神化的佛像和菩薩像，這是借鑑了希臘的造像風格。眾所周知，公元前 334 年到公元前 324 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東征，也將希臘文化帶到所到之處。古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地區(現巴基斯坦白沙瓦地區)深受希臘文化影響，吸收了希臘神人同形的造像傳統，產生了希臘文化影響的衣服襞褶厚重，強調錶情沉重內省的犍陀羅風格的佛像和菩薩像。隨即在印度北部雕刻藝術中心馬圖拉，出現衣服貼身，強調體格健壯，有肉體裸露感的馬圖拉風格的佛像雕刻藝術。

莫高窟隋唐以前的洞窟造像受到了犍陀羅風格和馬圖拉風格的深厚影響。公元 320 年—600 年是印度美術史中的笈多時代，創造了印度本土化的表情單純靜穆，薄紗透體的「濕衣佛像」為特徵的笈多佛教造像藝術。笈多藝術則更加遵循印度民族的古典主義審美，創作出純印度風格的佛像。這種佛像的特點之一就是佛像身穿通肩式薄衣，衣紋是一道道平行的 U 字形細線，具有流水般波動的韻律感。薄衣緊貼身體，像被水浸濕了一樣半透明，隱約凸現出全身的輪廓。莫高窟隋、唐前期的洞窟受到了笈多式風格的較深影響。笈多王朝之後，公元 8—12 世紀印度東北部的波羅王朝時期出現了印度密教藝術風格。從 8 世紀下葉到 13 世紀上葉，在莫高窟中唐、晚唐、五代、宋、西夏時期的洞窟壁畫也繪畫了這種呈現波羅藝術風格的菩薩像。它的特點是多取不同姿態的坐姿，頭光呈橢圓形，面相秀美，頭戴寶冠，髮髻高聳，曲髮披肩，寬肩細腰，裸露的上身斜披天衣，下著重裙和緊身透體的華麗長褲，雙耳、頸項、上臂、手腕、腳踝均戴華麗的環飾，描繪細膩。

另外，莫高窟隋唐以前的石窟形制也受到了印度石窟形制的影響。莫高窟北朝的中心塔柱窟的形制借鑑了印度支提窟，又把印度佛窟內的覆鉢形佛塔改造為中國樓閣式方形佛塔，同時把印度支提窟的穹隆頂前部改成了人字披頂，後部改成了平頂，人字披頂是中國木結構房屋最具特色的形式。還有莫高窟的禪窟，是在洞窟內主室兩側壁對稱的鑿出供僧人坐禪的小型洞窟，也是受印度毗訶羅窟影響。還有莫高窟隋代以前洞窟中的本生(釋迦牟尼前世)故事畫、佛傳故事畫、因緣(釋迦牟尼成佛後說法傳教)故事畫，也是受印度犍陀羅藝術的影響。

除了佛教藝術的影響外，還有印度教藝術的影響。畫在公元 538 年—539 年建造的莫高窟西魏第 285 窟正壁正龕兩側的摩醯首羅天、毗色紐天，他們原來是印度

教的主神濕婆和毗濕奴，這裡被佛教吸收為護法神。

過去很多人會認為中國和印度的僧侶相互往來的現象在唐代前期最盛，比如大家都耳熟能詳的玄奘和義淨。唐代「安史之亂」之後還有沒有呢？北京大學的榮新江教授在被英國人斯坦因拿走的、現藏於印度事務部圖書館的敦煌藏經洞文獻中就發現了一些漢文和藏文寫成的信札副本，它們既有當時經過敦煌去印度取經的中國僧侶留下來的，也有一些是從印度返回中國僧侶所寫，還有一些是印度來中國五台山巡禮印度僧侶所寫，因為五台山被認為是文殊菩薩的道場。這些印度保存的藏經洞信札表明，從初盛唐到中唐、再到晚唐、五代、宋，都有中印僧侶的交流活動，說明他們在敦煌停留過。編號為 S.383 的敦煌藏經洞文獻是一件稱《西天路竟》的抄本，由斯坦因帶走，藏於大英博物館。「路竟」的意思是「所經過的路程」，《西天路竟》是從東京開封至西天(印度)的路程。這個抄本記錄的是宋太祖乾德年間(公元 963—968 年)，由宋太祖下詔，派遣 157 位僧侶去印度求法的經過。他們的路線起自東京開封至靈州(今吳忠)，靈州西行至甘州(今張掖)、肅州(今酒泉)、玉門關(軍)、瓜州、沙州(今敦煌)，折而向北至伊州(今哈密)，由西行至高昌(今吐魯番)、龜茲(今庫車)，西南行至於闐(今和田)，再西行至疏勒(今喀什)，翻過帕米爾高原，進入印度半島，直至南印度。

莫高窟藏經洞中保存有證明中印交流的文獻。編號為 P.3303 的法國人伯希和帶走的敦煌殘卷是一份關於印度製糖法的記錄。印度北部是世界上製造蔗糖最早的地區，這份記錄表明了我國向印度學習製糖法以提高技藝的過程。

敦煌莫高窟中也有來自西亞古代波斯文化的影響。在西漢時期，我們就與波斯建立了聯繫。那是張騫第二次出使西域，當時的波斯帝國正處於安息王朝統治時期。安息派了使者給漢朝皇帝進獻了禮物。到了東漢，安息有一位叫安世高的僧人到洛陽翻譯佛經。莫高窟的壁畫中就描繪了和安世高相關的傳說。比如晚唐第 9 窟、五代第 108 窟和北宋第 454 窟甬道頂部繪有安世高赴江南途中所見的異事，情節是一條蟒蛇向安世高講述前世曾是他的同學，因為罪孽被化身為蟒蛇，如今願意捐出所有，請求安世高為他建造佛塔。這些神異傳說故事的繪製和傳播，都說明安世高在中國的知名度很高。

從漢代一直到明代，中原王朝和波斯都有往來。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和波斯間的來往頻繁。《魏書》記載，波斯使臣來中國交聘達數十次之多，給北魏皇帝帶來的各種禮品，有珍寶、馴象等。西魏時，朝廷派遣張道義率團出使波斯。到達敦煌附近的瓜州時，正趕上內亂，在滯留期間，還暫且代理管理瓜州事務，並將遇到的情況上報朝廷。波斯的薩珊王朝至公元 632 年起不斷受到大食軍隊的攻擊。公元 651 年被大食滅亡後，薩珊王朝末代國王的兒子卑路斯曾逃到中國唐朝避難，請求唐高宗救援。唐朝護送他返回波斯東部的錫斯坦一帶(今屬阿富汗)，並於公

元 661 年為他建立了波斯都督府，授卑路斯為都督。

這些不間斷的交流活動都為莫高窟留下了諸多波斯因素。比如，西魏第 285 窟的「五百強盜成佛」的故事畫。繪畫了官兵所騎的戰馬全身披掛裝備齊全的馬鎧，從保護馬頭的「面簾」，到保護馬後部尻部的「寄生」一應俱全。這種保護戰馬的防護裝備被認為源自波斯。又如隋代第 420 窟彩塑菩薩像的衣裙上繪滿了環形聯珠狩獵紋樣，每一枚紋樣的中心都畫有武士騎象舉棒形武器打虎的圖案。《舊唐書·西戎傳》中說波斯國「其國乘象而戰，每一象，戰士百人」，可見它是來自波斯的裝飾圖案紋樣。而像環形連珠紋這種裝飾紋樣，在波斯薩珊王朝時期是常見的紋樣。此外，藏經洞還出土有來自波斯的三夷教文書。

在敦煌莫高窟還能見到來自中亞的文化。如初唐第 220 窟《東方藥師經變》畫有中亞康國女子在小圓毯上表演快速旋轉的胡旋舞，舞者兩側有打擊、吹奏、彈撥樂器組成的伴奏樂隊。

文化傳播是很複雜的過程，傳播途中經過了若干次吸收和變化。敦煌壁畫從公元 6 世紀到 13 世紀都繪有豐富的日天圖像，比如西魏第 285 窟的日天坐在兩兩相背而行的駟馬車上。還有中唐第 144 窟畫的日天，騎在呈正面姿態的馬背上。這些形象里有印度和中亞的影響，又有希臘和波斯藝術的元素。公元 6 世紀畫在莫高窟第 285 窟的日天及其所乘坐的駟馬車是綜合了印度太陽神蘇利耶、深受波斯文化影響的中亞太陽神密特拉和希臘太陽神阿波羅圖像的影響。另外一個例子是莫高窟一些經變畫中經常出現人頭鳥身彈奏琵琶的伽陵頻伽(又叫妙音鳥)的形象，它最早的原型可能追溯到希臘神話中的海妖塞壬。因為它也是人頭鳥身身挎彈奏樂器的形象，她會用自己動聽的歌聲，使過往的水手聽的出神而觸礁沉海。

敦煌文化是多元文明之間對話、相互影響的結晶。沒有外來文明的滋養，不可能形成這樣豐富絢爛的洞窟藝術。